

农民增收: 事关全局, 任重而道远

Income Increase of the Peasants Affects the Overall Situation

贾大明

(农业部中国农垦经济研究与技术开发中心, 副研究员 北京 100810)

稳步增加农民的收入, 不仅是我国农村实现小康目标的要求, 是改善农民生存质量和启动国内市场的经济问题, 也是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稳定农业、稳定农村、事关全局的国家头等大问题。

一、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原因

近几年来, 在我国农副产品市场初步摆脱短缺, 供给较为充足的形势下, 出现了丰产不丰收、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普遍情况。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成为当前我国农村经济生活中较为突出的矛盾。1997年农民年均收入2 090元, 比1996年增长4.6%, 但增长速度回落4.4个百分点; 1998年农民年均收入2 160元, 比1997年增长4.3%, 增长速度又回落0.3个百分点。农民年收入增速连续两年下降是改革开放20年以来的第一次。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表层原因是: 市场疲软, 农副产品价格持续下滑, 农民出售农副产品总量虽增加, 但售后实得却下降了; 乡镇企业效益下降, 农民非农劳务收入随之减少; 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加速, 城镇对农民工需求锐减; 国家虽一再重申减轻农民负担, 但对农民的各种摊派和“三乱”仍屡禁不止, 农民的实际负担有增无减, 等等。究其深层次的原因为: 一是分隔城乡经济的二元体制没有根本性的变革, 国家长期实行的以剪刀差方式“以农补工”的政策, 造成农副产品价格背离价值, 人为地扭曲实际价格造成农民收入水平大大低于城镇居民。由于国有企业, 尤其是国有工业企业大面积亏损的状况难以有效扭转, 如仅国有粮食企业10年即亏损了2 400多亿元, 加上国企数千万职工转岗或下岗, 国家为了社会的稳定, 不得不限压农副产品价格; 限制城镇工矿使用农民工; 关闭小煤矿和污染严重的乡镇企业。以上种种措施, 主要目的是维持城镇国有企业和职工的基本收入。这种二元体制在计划经济机制下和建国初发展我国基础工业时, 有其合理因素, 但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 继续“以农补工”不仅违背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运行规律、制约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 使农民的经济收入增

长缓慢, 而且势必挫伤农民积极性。二是政府的行政、事业机构庞大、人员臃肿。耗资巨大的县、乡管理机构是农民负担有增无减的主因之一。我国有2 800个县市、50 000个乡镇政府、70万个行政村, 对我国9亿农民进行管理。一般一个乡镇设有20多个机构, 财政供养人员500人左右。其管理机构之多、非生产人员之众、管理费用和成本之高均为我国史无前例, 且列世界之最。供养这些众多机构、人员运作, 需耗费巨额资金, 而各级财政的预算又是极为有限的。经费不够就向农民摊派; 不切实际的“达标”重复建设也要向农民摊派; 大吃大喝搞腐败, 更要向农民摊派, 因此“三乱”横行, 屡禁不止。各地擅自设立收费项目, 诸如中小学生的教育附加费、民办教师统筹费、补课费; 农民建房时收取的土地登记费、村镇建设费、土地测量费; 农民结婚时收取的“学习”资料费, 外加报刊订阅费、母子保健费等等, 名目繁多不一而足。加上部分地区的干部工作方式简单粗暴, 严重侵犯农民权益的事件屡有发生, 往往造成干群关系紧张对立, 直接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三是由于农民居住和经营的分散, 无法掌握准确的信息, 在市场竞争机制下既缺乏有效的外部保护, 也没有行之有效的自我保护手段, 在同其他经济组织的交易中始终处于劣势地位, 难以保护自己的经济权益。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后果是严重的, 不仅影响农民生活质量的改善, 影响对农业生产再投入的能力与意愿, 更重要的是制约着我国农村市场的开拓, 也使国家力图刺激、扩大国内市场需求的努力更难以实现。不仅如此, 农民收入增长的缓慢, 农村消费市场的疲软, 还势将给我国工业开工不足、下岗人员增多、产成品库存积压和经营亏损加大的状况雪上加霜, 直接殃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今年农民收入状况的分析与预测

农民收入问题已引起国家重视, 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保护农民利益的政策措施, 以期保证农民在持续增收的前提下收入稳步增长。但是, 农民收入增长

缓慢问题是囿于体制不顺和结构不合理而积累起来的老问题。我们认为,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和管理体制显然不能顺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建立,而使之发生重大改革之前;在我国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工业企业改革没有取得重大突破并获得良好预期之前;在我国农业生产尚未改变重产量轻质量、农业结构尚未有根本性改变之前;在国内市场尚未对劳动力和农副产品形成巨大需求之前;在亚洲金融危机没有得到根本性缓解之前,农民的收入是不可能在此短时期内有较大幅度增长的。1999年,农民增加收入在宏观上虽有国家政策的支持,诸如今年4月29日财政部又出台了《关于治理向农民乱收费,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国家继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加大对农业和基础设施的投入、降低农村电价等;但从微观层面上讲,我们必须看到,今年农民减收的因素在明显增加。一是国家决定从今年起较大幅度地降低棉花的收购指导价,幅度下降23.5%,这将影响1亿棉农的收入;粮食定购价虽未降,但收购指标下降,有的省市已公布减少1/3的定购粮收购指标。由于国家定购价与保护价之间的实际差价,这意味着农民在出售主要农产品时收入将减少。二是国内市场持续疲软,农副产品价格反弹乏力。今年4月份,全国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期分别下降3.5%和2.2%。其中肉禽价格比去年同期下降12%。水果蔬菜价格也有不同程度下降。农副产品价格持续疲软,将直接影响今年农民的现金收入。三是我国农业与世界经济的关联度增强,

(上接第40页)

期工程将新建3个集装箱泊位,码头岸线长900米,先期设计通过能力60万TEU,设备增加后可达80万TEU。届时,加上原有黄浦江内的码头,上海港的集装箱泊位将达到16个,年通过能力达300万TEU。

拓展深水船道,建设深水枢纽港

与香港、新加坡、鹿特丹等世界著名的国际航运中心和高雄、神户、釜山等周边港口相比,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局限。主要是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小,直航能力有限。其中直接的因素是长江口航道受拦门沙影响,水深只有7米,无法满足吃水14米以上的第五、第六代大型集装箱船舶全天候满载进出港的要求,一些货物不得不经由香港、日本、韩国或其它国家转运。

目前,世界主要的国际航运中心都是集装箱枢纽港。集装箱船舶也正迅速向大型化发展,5000TEU左右箱位量、满载吃水14米以上的第五、第六代大型集装箱船舶开始逐渐成为国际集装箱运输的主流船型。面对这种发展趋势,香港、新加坡以及高雄、神户、釜山等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港口,都在不遗余力地建设水深达14~15米的集装箱泊位,2000年前上述

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也殃及农民收入的增加。近两年来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农产品出口和乡镇企业产品的出口交货值直线下降,至今未有根本性好转。农产品和乡镇企业出口的下降,不仅加剧了国内农副产品市场供求失衡的矛盾,制约了农业生产和乡镇的发展,也将影响农民收入的增长。四是县、乡机构改革要迟滞至2000年,精减机构、精减人员、精减管理成本,以减轻农民负担为目的的体制改革的成效,至少要到下个世纪初的头几年方能见效。五是农业结构调整,尤其是优质高效产品的调整难以较快推动。因为,一方面需要巨大的市场需求和拉动,另一方面则需要巨大的资本投入。在目前宏观经济状况下,市场需求不足将维系较长时间;而国家和农民都没有能力投入巨额资本进行结构性调整,即使启动了农业结构调整后,也有一个生产、市场、消费适应的渐进的过程。凡此种种,决定了今年及近几年内,农民负担沉重的状况还不可能有根本性改观。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宏观经济改革的深入,农民收入增长问题将日益成为不可掉以轻心的事关全局的大事,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另外,解决农民收入增长问题的广泛涉及面和异常复杂性也远超过人们的想象。这些均将进一步激励、促使我们农业工作者深入农村、深入农民,了解农情、了解国情,发现并制定更加结合实际的有效措施,以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把造福农民、稳定农村作为头等大事,持之以恒地做实做好。

(责任编辑 蔡德诚)

各港将有40多个深水泊位竣工。虽然长江口深水航道治理一期工程已经开工建设,但许多专家指出,长江口的最终治理目标仅达12.5米水深,无法满足船舶大型化环球航运的需要,况且需要10年才能完成治理。而5~10年内上海如不建成深水枢纽港,必将丧失机遇,沦为喂给港、支线港,故急需在长江口拦门沙以外尽快建设15米水深的集装箱枢纽港。

深水港是上海迈向21世纪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深水港建设是关系到上海能否成为国际航运中心的关键问题,最终将决定上海在下一个世纪的定位。

上海地区专家学者们目前已完成了深水港选址方案的比选论证,确定了上海国际集装箱深水枢纽港的港址。目前正抓紧进行深水港址的深化论证及开工前期工作。

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建成将在中国再崛起一个国际级的集装箱枢纽港,并与已成为国际航运中心的香港一起,共同成为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融合的重要节点以及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连接的重要枢纽,并将带动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区域的全面开发开放,为上海再度崛起成为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发挥巨大作用。

(责任编辑 蔡德诚)